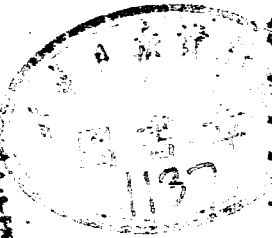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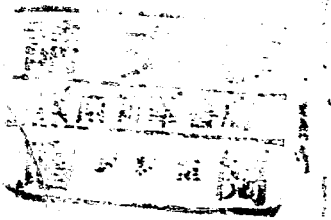


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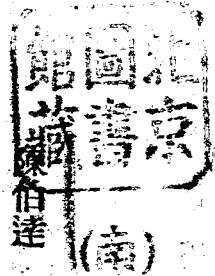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發行





117
27.6
161

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



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說到近代中國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革命的民主派——孫中山先生，一個是竊國大盜的專制派——袁世凱。

袁世凱——他已死得將近三十年，但是，作爲一個政治的人，這個人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所時常接觸到的。他身死了，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的靈魂，却被他的後輩復活了。作爲一種政治的象徵來說，袁世凱在現實的政治中，仍然高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由於發展的結果，現實的袁世凱，在手段的殘酷與陰毒上，終究遠遠地超過了已死的袁世凱。

袁世凱——這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他並不是一個普通舊式的政治人物。袁世凱——這個政治人物是出現在近代中國維新與革命、革命與反革命互相鬥爭的時代，在這種不正常的時代，反動派爲要更有效更集中力量來殺戮中國的前進，就鑲鍊出了一個這種不正常的入物。

袁世凱起初是由房毅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李鴻章和滿清朝廷的實力派——榮祿所特別賞識的。李鴻章臨死時候，又向慈禧太后保薦他作爲自己的接替人，說是：「願圖宇內人才，無出袁

世凱右者。一切反動派把你看成中國的主柱，想經過他來搖擺中國人民對於舊中國的衝擊。爲什麼袁世凱這特別被一切反動派所倚靠呢？因爲他在反對中國進步的事業和中國人民的事業上有特別的機智，特別的手腕，而在他的手裏還有一支反對中國人民的特別武裝力量。

袁世凱曾經做過維新派，參加過當時陸有爲等人所組織的君主立憲的維新團體——強學會。陸有爲等人當是代表一部份「開明」地主和一部份與大工業若干關係，而在政治上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水資產階級，其所進行的經過皇帝少數貴族的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是陸有爲、而且根本反對民衆參加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這種運動是沒有結果又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結果的運動，不但爲戊戌政變自身所證明，而且爲全部中國近代史所證明，關於這些，我不準備在這裏多說，我這裏要說的是關於袁世凱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戊戌維新運動之前，袁世凱雖則經過李鴻章與榮祿的賞識，得在小站練兵，但是，他在清朝廷的地位並不高。到了戊戌運動的時候，袁世凱因爲參加過強學會的機緣，經過維新派譚嗣同的保舉，就從光緒皇帝那裏（八月初一日被召見）取得了特賞侍郎專辦練兵事務的職務，就是說，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提升了自己，在清朝廷中的地位。但是重要的，還不是因此取得侍郎的地位；就袁世凱本人來說，還地位固然是升了一步，但在朝廷中來說，這地位並不是很高的。對於袁世凱，對於當時整個反維新派，重要的，就是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參加了當時關於維新派命運的計劃，這計劃：要當那集中滿清朝廷黑暗統治的最後權威者——西太后準備於九月天津閱兵利用榮祿軍隊威脅廢立光緒帝時候，袁世凱的軍隊起而保護光緒帝，並誅殺榮祿。袁世凱以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答應充當維新派的主角，但實際上，他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在他談好這個計劃之後，却馬上充當了反維新派的主角。他把全部計劃對譚嗣同反維新派，因而使反維新派得以把維新派納在血泥裏面。

當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和袁世凱進行這種與虎謀皮的計劃的時候，譚嗣同會告訴袁世凱：如果不

顯意幹的話，就請袁世凱到和園向西太后告密，把他舉報殺掉，可以得富貴。袁世凱正色厲聲說道：「你把我袁某當成怎樣的人呀？」但是，一日之間，正是袁世凱，不別人，就向西太后和榮祿顯功，告發譚嗣同及其同伴的密謀，結果，百日維新運動（從四月至八月初）就像曇花一現。站上光緒皇帝背後虎視眈眈的西太后於八月初六日當面臨朝親政，把譚嗣同等人殺掉了，又把袁世凱當時所稱爲「廢代之要主」的光緒皇帝關防起來了。譚嗣同的話果然不錯，袁世凱就從此大富大貴了。揮足維新派，轉過頭來，用賣維新派，這就是袁世凱第一次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顯現的身手。這種兩面派的「機智」，兩面派的「手腕」，就是袁世凱特別的機智和特別手腕之重要的組成，或者更正當地說，是其主要的組成。這種兩面派的作爲，使袁世凱在當時最黑暗的勢力中得到最大的愛寵。

戊戌政變之後，袁世凱的第二個拿手好戲，便是鎮壓人民反帝帝國主義侵略的自發運動——義和團運動，而又對外按兵不動，觀望八國聯軍的侵略北京。這樣，袁世凱在受中國內部反動派贊賞之後，又再加上受外國人的贊賞了，隨後他就得繼續李鴻章，担任了當時舉足輕重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職任。

袁世凱所以得在政治上進行、投機、大買賣，並經過這種投機的買賣，左宜右有，與妖作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消說，是因為他有一種資本，這就是他在小站練兵時所弄起（所謂「新建師軍」）。這袁世凱所居的奇貨。在戊戌政變的時候，維新派和譚嗣同等所以特別要去結納他，就是因為他們是浮在天上，他們想依靠袁世凱帶領的軍隊去站住脚。不，依靠袁某，而是依靠宮庭的陰謀，不是公開向人民羣衆求救，而是秘密向軍閥求救，這在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深淵。袁世凱的特志正是利用了戊戌維新派這個弱點，把維新派引上釣鉤，而後來烹吃他們。在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外國人所以特別贊賞袁世凱，也就是因為他有一支帶有新式武器的軍隊，可以

補助外國人來血洗當時那種僅有原始武器或手無寸鐵的羣衆。

小站練兵——這就是袁世凱自己的政治實業建立了力量的基礎。他從這裏開始組織了作爲竊國之用的北洋軍隊，培養了和團結了一大批竊國的爪牙（武的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占元，曹錕，段芝貴等；文的如徐世昌等），並造成了「一種竊國的觀念——即所謂「北洋正統」。

以「新建陸軍」的力量爲體，以兩面派的手段爲用，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得到中國的和外國的反動派的扶持，變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

(二)

辛亥革命，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革命是人民歷來反對滿清朝廷所鬱積而大爆發的結果，革命的發展是很迅速的。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革命的活動地盤主要的是舊形式的民衆組織（會黨）和新軍，即這種會黨和軍隊主要的以農民大衆構成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的孫中山民主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這個革命的政治綱領，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可是革命有它的弱點。工人們英勇地參加鬥爭，但那時中樞無一階級還弱小，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起以民衆的自覺性和組織性顯然還很不够的。而且起義內部又是各種矛盾的結合。各階級是在反滿的目標上結合起來。除此以外，目標絕不一致的。反滿的革命同盟會本身就，這樣矛盾的組織。辛亥革命本身更。這種矛盾的革命，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太過軟弱，和民衆的結合太不足，並且不但不敢使人受勝利，乃至隨時可能把革命交給反革命，而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面前也不能形成堅決的獨立力量。原來一部份和工業，即的大資產階級和一部份「匪幫」的地主。君主立憲派因爲諱避立憲沒有結果，對清廷絕望，挺而走險。競相附屬於革命，在革命內部努力取得權力，各省區代表

統之體，較，機關爲主體，個人爲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違法理，自以個人凌躐機關之行動，則爲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

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機關就個人」了。「個人凌躐機關了」。神聖也可以侵犯了。袁氏在北京就職，居然也還是被專使們認爲「尊重法理」，也沒有「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袁世凱早已看穿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空談無用。袁世凱左右了法理，而並不，法理左右了袁世凱。袁氏「朕即國家」已不是「嫌疑」的問題，而從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候便已開始了。

當南北談判還沒有結果，「民國政府」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還沒有決定交出權力的時候，袁世凱給梁鼎芬的信說是：「惟有益緊羸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奮此愚忠，戰戰兢兢，但求皇統之能保存……」。又時常對人說：「余深荷國恩（按：指清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指溥儀）寡婦（指隆裕太后）乎？」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描繪的：「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一愛新覺羅之大忠臣」。但是，一等到「民國政府」向他屈服的時候，他就對臨時政府這末說了：「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國體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這些當然又是：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中華民國之大忠臣。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斷言是對的：「大奸大竊。其貌每大忠臣」。袁世凱的字典中，大忠大信的註解，便是：奸大竊。當他在宣誓忠於滿清皇室的時候，正想不進行轉移清祚到他自己手裏的時候。當他在宣誓忠於共和的時候，又正是在準備完全毀滅共和的時候。

中國出現新的皇朝，這就是袁世凱的皇朝。但袁世凱開始是採取了「民國」的形式。對於袁世凱，這「建立正式的、公開的袁氏皇朝」過渡形式。

(三)

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各階級在反滿的目標下來一個向「左」走。革命的發展也就來得很迅速；在反滿的目標告一段落之後，參加起義的各派即來一個向右走。革命的失敗也就又來得很迅速。

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派和袁世凱妥協之後，放棄了革命，變成了在野黨；原來一部份地主和大地主階級的君主立憲派則變成了政府黨。

原來的革命同盟黨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已開始分化。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同盟黨和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譚延闓等）及一些舊官僚（如唐紹儀等）結合起來，組成國民黨（民國元年八月成立）；為在野黨；而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張謇、湯化龍等）及一些舊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等）則又和同盟黨的另一部份人（如章炳麟、張伯烈等）結合起來，組成共和黨（民國元年五月成立），是為政府黨。這是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並立的兩大黨。不久，章炳麟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維持他原來成立的「統一黨」，而參加共和黨的一些君主立憲派（如湯化龍、林長民）和另一部份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孫毓汶）又以梁啟超為首領，另行成立所謂「民主黨」，打算操縱於參議院上這兩大黨之間。

作為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分別，是在於呢？國民黨的政綱是：（一）促成政治統一；（二）發展地方自治；（三）實行種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維持國際和平。共和黨的政綱是：（一）（一）保衛國權統一，採取國家主義；（二）（二）以威權權力，扶持人民進步；（三）

孫中山比較急進地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但又反映他們的弱點），在國民黨內也被認為「不守舊行」的「理想派」。這時候陷於失勢的地位，但是，即使孫中山不「當時也是決心」繼續政權於袁氏，「宣言十年不預政治」俾國人專心信託之。所謂「正式選舉」的選舉結果，國民黨佔大多數之後，孫中山仍然聲明：「余已力辭正式總統之候補，黃君（克強）亦必力辭，此事終不能不預袁君」。國民黨與共和黨對袁世凱政權問題上的區別，就是：國民黨擁護而又公開，袁的權力，共和黨則擁護並贊成袁集中權力。國民黨還必有代表一部份中等資產階級利益的色彩，但實際上，兩黨又都是代表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兩個不同集團的政黨；大部

其任職共和黨後，其進程與急進外，其進程黨的政綱在基本上已看不出有什麼急進與漸進的分別。國民黨時代反陳小資產階級要求，急進綱領（如孫中山所提出的「土地國有」、「平均地權」）本來是為着吸引會黨——下層社會參加反滿革命的，現在反滿的「革命功成」，反滿的「革命算清」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表現了消沉，會黨的下層羣衆被拋出黨外，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早被忘記得乾淨，僅剩下一條毫無內容的、極端抽象的所謂「注重民生政策」。其他如「男女平等」的資產階級綱領也沒有了。「力謀國際平等」的綱領也改成「維持國際和平」了。軟弱中等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地位也已走下坡，有些同盟會黨員會經因同盟會與各種官僚政客的政治合併，完全拋棄同盟會的革命傳統，而痛哭過，但終歸沒有能力阻止宋教仁這種併黨的「政治手腕」（當時人稱「胡野合作」）。它是袁世凱中央政權的在野黨，但却是力謀對袁妥協，而不是要推翻袁世凱的在野黨。黃興、宋教仁是國民黨這種妥協派特出的代表。黃興甚

實是偏重於代表新起的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爲「急進」；兩共和黨則側重於代表舊有的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爲「漸進」。但實際上，前者原來的所謂「革命」，已一變而爲取消主義，後者原來的所謂「開明」，已一變而爲守舊主義。兩黨人物傳統的政治鬥爭（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無疑地影射了這兩黨在袁世凱面前的鬥爭。又影射了袁世凱對這兩黨的喜憎態度。人民已開始感覺，那是限於爭權的鬥爭，而很少原則的鬥爭。人民對於前者的鬥爭，已開始感覺得有些不耐煩，但袁世凱看到這兩黨的無原則鬥爭，則引爲大樂，因爲這種吵鬧不但有他在內，且能挑撥，而且這種吵鬧正使他得用作證據，以證明個人獨裁之好，而政黨則爲無用。

兩黨分黨權力的主張，就是關於所謂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這是袁世凱所認爲他們擁護美中不足，主要東西。當經過革命震動之後，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袁世凱來代表他們，集中權力以穩定他們的統治的秩序；而和大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那一部份人也同樣地渴望經過他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袁世凱正以這種秩序的「救主」願盼英雄，他怎樣會肯分出權力呢？而且你已向他交出了權力，是你給他的便宜，現在又想向他要出一部份（那怕是很小的很小的）權力，却就不給你這樣便宜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反革命人民的大獨裁者對於權力都是極端吝嗇。沒有一個反革命人民的大獨裁者願意分出一部份權力給人的。相反，權力的貪得無厭，正。歷史上一切大獨裁者的特色。你看！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還是母子的關係（雖然是過禮的），但西太后總願意把一點權力分給她的過繼兒子的，甚至臨死的時候，還認爲「我不能先你死」，而得毒地把光緒帝先毒死了（有一種傳說，袁世凱怕西太后死後光緒帝對她報復，曾參與毒死西太后的陰謀）。何況對於袁世凱說來，國民黨還異己的勢力，袁世凱能因爲國民黨的擁護，而即出讓一部份權力？所以，不論責任內閣也吧，地方自治也吧，袁世凱都是不會有所

進步的。

袁世凱雖然取得了總統，但在他看來，一切對他的獨裁權力有所礙乎礙足的，都必須完全「掃蕩」，他必須繼續他的「統一」事業，特別由於辛亥革命在各省所造成的局面，當時國民黨人因為同盟會的關係，還佔有南方六七省的地盤（都督是國民黨人），這是他所必爭的。他不能因為「民國政府」已獻出中央政權，而就承認「滿足」的。他也不可能因為同盟會已改組為在他政權下的安協黨，而就可認為滿足的。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派系的地盤，一切還沒有落在他的直接掌握中的，他都是要一一收拾的。你交出權力！再交出權力！還再交出權力！這就是他對一切異己者的要求。當他一登總統之台，他便逐步地，而且不遺餘力地，集中他在這方面的注意力。

袁世凱的「統一」旗幟，一個是「軍令」，又一個是「政令」。在就任臨時總統後二十天（民國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就頒佈了「訓勉軍人令」，提出「服從統一命令」，這個軍令就是為的要消滅辛亥革命後的各省起義部隊，以及其他一切異己的部隊，至少要把各省起義部隊，以及一切異己的部隊改編成御用的部隊。四月二十九日，他出席參議院的演說，開宗明義提出「古今立國之道，惟在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這個政令就是為的打散起義各省人民所自發取得的若干自由權利，以及其他一切在異己手裏的權力，以維持他所統治的秩序。固然，紀綱只是袁世凱的紀綱，法度也只是袁世凱的法度；但你以為他個人要人家服從他的紀綱和他的法度，就說他私圖嗎？此地無銀三兩。別人還有私圖嗎？至如袁世凱，據「歷來莊嚴的聲明」，那是一黨私圖都沒有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本來在老家，就是「私翼翹翹」，是為老農以沒世」的；滿清窮途向他表示求救，要他出來鎮壓革命之後，他就聲明「一俟大局稍安，即歸相定，便會退避賢路，翩然挂冠，戒都之衆，京陵之民，足殫此生，庶幾乃願」的；等到他用盡手段，取

得大總統而甘心之後，他仍認說，這還完全不是他的「私願」，他的私願本來是躬逢「共和政體」盛舉，就要「從比退休田畝，共享昇平」的。但是，既然「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他就只好做下去。而且按照他的邏輯，「國民」既然「委託」他了，他就是「民意」的代表，反對他也就等於反對國民。在民國政體下面，反對國民有什麼意思呢？那當然就是反對民國，危害民國了，於是他就自有保護民國的責任，可以出這種「反對國民、危害民國」的人鎮壓下去。看他就職大總統後，不過三個月，他的姿態就已經是一個十足的「民國的保護者」了。他說：

「……世凱得茲艱鉅，自不得不力為支持，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知世凱既負國民之委託，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復處與毒蛇，致民國前途於不保收拾，縱人不我責，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作，亦復過備其他？……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發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知非罪我，付之公論。」

你看！袁世凱原來是一點私心都「沒有」的，他是共和得很，「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的。有私心的是誰呢？那當然是不能對世凱「開懷相諒」，不能任他「予取予求」的人，乃至是「不滿意他、反對世的人。由袁世凱看來，他們都是「天下為私」的。對這種「不顧大局」的人，他已經極其委曲求全了。但是，如果他們還不願意完全投降，繳出家私，他「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這是他們該死，絲毫不能怪到他的。責備、專制自為，責備、專斷獨裁，都不過是「悠悠之口」，「擾亂之階」。

同時，世對於當時由他在背後操縱的各政黨，又以「民國的保護者」的姿態，出來教訓他們息爭了。

「方念民國初興，尙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任何政黨，均宜圖

除成見，專聽於兩利必勝之一途。若乃使陰謀。政成遂無。得非孫也，飛也極也。請法
今者爭論。以爲實爲私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生。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之初心。其
將何以自保？與曹氏共。毋從中取。凡我國民。務念國難深重之患言。彼同盟操戈。一
折衷真頭。互相提攜。忍此小嫌。而扶大局。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你看：袁世凱多「愛國」呵！他豈沒有政績成見的，也豈真知道「利己福的」，他是主張團
結的，他是主張容忍的，他是主張外禦其侮的，也是反對同盟操戈的！

民元八月間，孫中山和黃興北上。九月間，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發表一個通告。通告：「
大總統旁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捐入我之見，兩極救濟之方，請孫中山、黃克
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款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而協定內。大綱八條……」。末了又稱：「
各黨元首與各政黨首領，互相提攜，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遂行標準，如軍、職、知、舟、有
枕，無旁擾，無中阻，以專趨於兩利必勝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可呼！」說得又「多末」「誠懇」
、多末「仁至義盡」呵！

但這個「民國的保護者」「正」旁心焦思，幾廢寢食，一步一步地進行把中國變成袁世凱
的私產。唐紹儀是一個平日在袁世凱下面辦事，替袁世凱辦外交的人，他代表袁世凱閣下議和，
因而加入同盟會，旋被袁世凱提議爲袁政權第一任內閣總理，但却敢以「民國內閣總理」的名義
和袁世凱爭副總統責任，這個內閣不過三個月，很快地垮台了。那個辛亥革命還留下著，但已運作
爲袁世凱專政分飾的參議院，不肯通過陸徵祥內閣的名單，馬上有什麼叫做「北京軍警特別聯合
會」出來發通電發傳單反對了，又有什麼叫做「軍警會議公所」開特別會議，張武力解散參議院
了，結果當然又是軍警戰勝了參議院，內閣的名單通過了。又過打不久，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
趙秉鈞，經過黃興的轉遞，得到了參議院國民黨人的同意，公然後任爲內閣總理了。而且這

傅「趙內閣總理」和他的「國務員」這班寫了入國民黨的請書。參議院原來是國民黨人佔多數，他們既一心只想掛起一個「政黨內閣」的招牌，來滿足其「政治慾」。趙秉鈞當了國務總理，傅和他的副員便被邀請入黨，趙內閣就變成所謂國民黨內閣，叫國民黨人一時大高其興。這樣，國民黨要求「政黨內閣」——正如當時「開界」所恰當認識的——却變成了「內閣政黨」。這樣，參議院與趙內閣也就沒有可「爭」了，袁世凱也就真「統一」了。

不久，宋教仁以國民黨組織的資格，利用國民黨在「正式國會」的選舉中佔多數，一面主張選袁世凱為正式總統，但一面主張以國會多數黨組織責任內閣，而他自己便「活」作為這個政黨內閣的候選人，真正企圖在袁世凱的「警察」刀下，分嘗一杯羹。宋教仁這種活動，這個可憐的幻想，雖然和袁世凱平日吞併異己的陰謀，即「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不符合的，對於袁世凱，可以同意那種趙秉鈞式的，以袁氏自己心腹而組織的資格參加參議院政黨。但決不能夠同意這種宋教仁所企圖的，以袁氏異己的國會多數黨的資格組織內閣。於是，正當召集國會的前夜，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車站被刺殺了。袁世凱得這消息的時候，表現了「愕然」的神氣。說：「有此事乎？即命余覓報來！」看了報之後，他又「愕然」地說：「確實！這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選初，少了一大主腦，以後種種說話。」他又即電令江蘇都督和民政長：「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情嚴辦。」確確實實，主名不難明。正當袁世凱發覺世凱，經理就是袁世凱的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進行動」的，就是袁世凱在上海的議會——「華民共進會」會長趙秉鈞。後來趙秉鈞被袁世凱北上成功，但是正如賡復所說：「左右難親，卷源難認，利權則交亡。」袁世凱在門口起見，就暗地叫「法」門七條圍殺。趙秉鈞感到死無惡，向袁世凱嗚不平，謂「如此，以管轄官為總統後事？」沒有幾天功夫，趙秉鈞也終於七條流血，嗚呼哀哉，應桂廷和趙秉鈞等都按照袁世凱「法」門圍殺了。但並

不。因爲他的「謀殺案」與「假幣」，都是國貨。他得承認他的「假幣」。
至於該殺的「宋案」呢？按照袁世凱的「法」，當然他是不受處罰的，但是「假幣」一切這
究他進行謀殺的人了。

「不做，二不休。據『謀殺案』袁世凱從五銀行得到一。所謂『善後』借款，就決心
發動了剷除異己的大內戰，這就是『國民黨』年所謂『贛寧之役』。內戰『善後』借款，就一
。在清末時，便爲袁世凱爭權的政敵——岑春煊托人進言調和。袁世凱說：

「今日並非調和南北問題，乃係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問題。宋案自有法院
，借款自有議會，我與岑君等皆不能說話。……至李烈鈞等爲地方長官，於行政之系統上
，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

你看！袁世凱多末「光明正大」呵！雖則法院傳不到宋案正犯，國會也沒有通過借款，但袁
世凱說：「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他絲毫沒有干預過的，而且還「不能說話」。他
是「奉公守法」的呵！至於什麼「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呀，「於行政之系統上，
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呀，這類「理由」他當然登載皇報，我們現在聽來，真是如聞其聲，如
見其人。

在得到外國強有力的撐腰之後，袁世凱發出了強硬的聲明：

「我現在已決心。求現在看孫孫（文）黃（興），除境亂外無本領。左文是搗亂，右
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搗亂』自信政
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曾不願，然今日請求敢多
讓。彼等若敢另外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袁世凱遺囑中此一句。）
你看！袁世凱就是這末威風凜凜了。就是這末激氣騰騰了。這期話，我們現在聽來，同樣地

更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當然，他依然是「民國忠實的公僕」。在內戰箭在弦上的時候，民國二年五月間，他和一個外國記者還末談話：

「外國記者：近有人評論總統並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復君主舊制，有是事乎？」

袁世凱：予知此種謠傳，自不能免；既然爲公僕，實難逃誘誘乎？余既負此職務，必家盡余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壞之危險，決非自余前坐，必由於一般暴徒，以破壞與當爲主者說也。

外國記者：有人謂總統欲仿勃拿梅當，信乎？

袁（笑）：余欲爲華盛頓非拿破崙也。華盛頓爲歷史中更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余何敢欲爲拿破崙而不爲華盛頓乎？

外國記者：現在中國最要之事爲何？

袁：對內對外均以和平，此爲最要之事。」

「信不信由你」，而他的話是「誠懇」的。民國在他這裏，華盛頓在他這裏，和平也在他的裏。可是，口沫未乾，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就向那當時以孫中山爲代表的殘存民主勢力——即向那「以破壞國家爲主義」的「一般暴徒」——發出討伐令了。那個討伐令很長，文章唯在「統一」二字。據「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說，他讀了這充滿感情而原諒過他（所謂「歷史爲政困難各點，想其實情，未嘗不感，而可知諒於其要求增加權力之用心」）。這個討伐令的後面部份是這樣寫的：

「今欲濟此時艱，勦求治道，條理雖多，本原惟一：首在規復政令之紀綱，進行國家之威信。此本有撥，他復何望？本大總統昔以仁柔姑息，延茲厲階；今當以勇猛雷動，殲彼

前題。做做就破壞民國，惟本大總統責當保之，叛黨欲斃袁生靈，惟本大總統責當拯之。垂涕伐罪，苦心贊天。紀綱所繫，威信所歸，難懷痛悼，其安得已。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或亦除舊布新之機。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則拯墜日於虞淵，完滯舟於駭浪，雖云甚難，何適無術？所賴國人共宏大願。本大總統老矣，六十老翁，復何所求？顧斷不忍五十年神明古國，顛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許謀覆國家之鬼使以自恣。冀與邦人諸友，多辛茹苦，冒險犯難，從此圖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衆。」

袁世凱口中的「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翻譯為比較新式的口號，就是：「軍令政令之統一」。按照袁世凱，除了全部權力都統一到他的手裏外，中國就再沒有出路，一切就都沒有附屬。「統一」與袁世凱「救國萬應丹」。當然，這並不是中國人民的統一，不是民族的統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袁世凱所追求的「反人民、反民族的」獨裁者的專制者的統一。「據袁世凱自己的告白：他以前的罪過在於「寬大」，所以「統一」不起來，現在要給大家看看他的手段了。「以袁氏生平之歷史，對於滿清，惟知辱權傾勢，於屬吏，則專以會讀不識字之流為爪牙，至於民事，則除却捕黨、逼民氣、斂財肥己而外無所能。」可是按照袁世凱自己所說，他現在却是民國唯一的「保姆」，生靈唯一的「救主」，而創造民國有功的在野民主派孫中山等人，却是「破壞民國，塗炭生靈」的「叛黨」。對於這樣「謀殺國家的兇徒」。什麼辦法呢？這位慈悲心深的六十老翁，萬不得已，只好揮淚起兵了。按照袁世凱，這不是反動，而是「除盜布新」；這不是專制，而是「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這不是他私心有「何所求」，而是他希望「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懲歎休哉！這樣的大總統，簡直是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袁世凱目比華盛頓，真太綠廬了。

除了袁世凱這惡心深的禍根外，袁世凱當然還有他討伐的法律根據，另一道討伐令就拿出法律根據來了。

「該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竊土地，擅行宣佈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爲，實爲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備警戒，并用兵定亂，爲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

民國的「國家法律」，變成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變成民國的「國家法律」。當時在野黨許多人也祭起「法律」的旗子，想要經過這種「法」，製袁。但當時孫中山的估計是對的：「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

袁世凱嘲嗤這人，國民黨人一切的卑躬屈節都落空了。國民黨人本來想以袁世凱政權下組織責任內閣，現在却以袁世凱的內閣（此時由段祺瑞代理）要問國民黨人的責任。孫中山主張爲「純粹之野黨」，不問袁世凱的政治，專辦實業，但袁世凱的政治却要問孫中山的「實業」了。孫中山依然是被叫作「亂黨孫文」，宋教仁業已因穩健飲彈而死。黃興也以穩健派而列名爲逆首，罪名都是「破壞民國之統一」。安協者自食其報。國民黨人既放棄民衆，而和反革命作犧牲革命的妥協，既放棄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綱領，把他們的綱領降低到袁氏的與黨綱領差不多一樣，結果就把自己從民衆方面孤立起來，並且不但沒有解開袁世凱對於他們的敵視，反而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對他們的卑視，與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合併異己的野心，同時也促進了袁世凱的與黨（此時共和黨已與統一黨、民主黨按照袁世凱的計劃合併起來，叫做進步黨）更堅決地站。袁世凱方面兩成代表世凱動員「輿論」的先驅。這種反革命作投降的妥協又在野黨內部引起了精神的瓦解，政治的混亂，形成了離心離德和各找出路的現象，即促進了其內部的分裂，並鼓勵一大批賣身求榮的人，這就便利於袁世凱的襲擊。妥協變成了投降，因而妥協就註定了失敗。等到他們受

袁世凱的大迫脅，臨海海軍，在民衆面前自陳前直，重新向袁求救的時候；民衆因受處一處迫脅，沒有從他們手裏真正得到福共和的利益，對他們的行動表示了懷疑。袁示了治罪。另一方面，帝制主義和一般大地主、大實業、大金融家、乃至企業家——如前兩所說，又正需要袁世凱的軍隊穩定他們的秩序。老奸巨滑的袁，就對他們進行了突然的變軍。他們就手足無措了。

當宋案暴露和袁世凱公開挑戰的時候，孫中山積極起來，主張對袁採取堅硬的討伐行動，表示了民主主義者的氣概但是却只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黃興遲疑不前；而各省都督的發難，則已在袁世凱軍隊南下四佈，獲得絕對優勢之後。戰爭在七月間爆發。討袁軍據六七省的地盤，無有數十萬的軍隊，但因為他們和民衆是分裂的，心內部是分裂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被袁世凱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袁世凱與高采烈，奏了自己的「凱歌」。

這是袁世凱的又一次「全國統一」。袁世凱的權力又增加了一步。且再看袁世凱取得了這又一次「統一」後，如何實行他的「勤求治道」吧！

四

在打散討袁軍之後，袁世凱就準備經過「正式國會」，把自己由臨時大總統升任爲正式大總統。

我們這裏先由國會說起。

所謂國會，這是中華民國的虛僞招牌，實際上，這和過去參議院一樣，不過是袁世凱專政的花瓶。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特有的國會。

原來所謂國會議員並不是真正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這只是一批欺騙的金錢買賣。在初選時候，

舊地方的所謂「候選人」(其中一部分屬於官僚，政客，黨棍和原來的紳士，土豪一類)，他們在投票選舉名冊，雇人投票「選舉」自己，並且各「候選人」之中又互相做一番買賣，誰的勢力較大，花錢越多，誰就越多「選」。在初選中這未買賣之後，「當選」的，也就得了錢，可以在「複選」中做一幾較大的買賣，看誰的勢力大，誰買票的錢多，他就賣票給誰，這樣，他就不但撈回了在初選中投下的本，並且還重獲了幾；而誰花錢越多的，買的票數當然也越多，也就可以「正式當選」做起國會議員了。這批議員一到了北京，便又可以做一番更大的買賣，除給一黨，賣給那黨，而最大的買主，並且各黨背後操縱者，便一發世凱，「正式收買方法，除賄黨入意外，有不必要賄黨入黨，投一票贊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不必投一票贊成一事，止不賄席便有若干金者……；還有買賣議員從中贊成者，未能如約得折扣之資，竟提出賄款，以買票賄大鵬鴨亦無不資不付為比者」(鄒魯：「中國國民黨史論」)。「此輩，以一身家資與四五黨者，賣完之後，一律脫黨，自名厥業競爭，其實是等到將來有大舉買賣時，做一回大買賣，免得受商議拘束」(黃遠生遺著)。這樣的議員所組成的國會，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玩弄的工具。選舉時，由於國民黨這前這樣議員所形成的議會政黨，又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玩弄的工具。選舉時，由於國民黨這六七省的地盤，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影響，「吸收無數的投機政客」，全力「選舉」上角逐，竟佔國會的絕對多數。如前所述，宋教仁就是因爲國民黨的「選舉」勝利，而熱衷於「謀」(續)內閣。袁世凱本來認爲他的武力足以戰勝一切，左右一切，對於這種選舉，沒有加以特別注意。後來看到選舉的結果，「始悟疏忽選舉之失策，乃別圖補救。」宋教仁被捕，便袁世凱這「補救」政策的一着。測末在民國二年三月二日，不過廿天，四、八日，國會便正式開幕。二十九日，即袁世凱策劃的內閣空氣瀰漫全國的時候，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黨便依照計劃下「應運合組進步黨，大爲政府張目」。另一方面，國民黨議員不復有對國會議員和武

兩派。西的黨制下，兩派始終分裂為各小政黨。議員們只要錢可賺，便以自身黨派，而長其權。朝令夕改，便成爲他們的舉動。國民黨既在國會的多數黨，於是國民黨議員便成爲袁世凱收買的主要對象，國會已完全在袁氏玩弄中。

在袁世凱以人民的武力和財力的統治範圍之下，縱使在野黨原來是在國會佔多數的，但是國會却易爲只能讓袁世凱獨裁的工具。

在續籌議院中，進步黨的熊希齡使袁世凱提出爲內閣總理。熊希齡在清末是屬於康梁的君主立憲派。原來有名的君主立憲派如梁啟超張謇都造此時進步黨的首腦，也都是熊內閣的議員。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共同通過這進步黨即原來君主立憲黨的內閣。袁世凱的策略是先取得與黨，孤立和拆散在野黨，暫且總統利用與黨以內閣的名義及其言論機關相助，以便於自己用武力把在野黨打碎到底，並使這個與黨在這種打碎在野黨的事業中負有名義上的共同責任，表示他的行動是大公無私；而後在利用這與黨的過程中，一方面提防與黨的驕縱，避免與黨的聲名過盛，另一方面便準備利用它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倒轉過來，也把它收拾，拆散，寫掉。熊內閣的成立，使袁世凱這種策略的運用。熊希齡梁啟超在戊戌政變時候，是吃過袁世凱的虧的，現在却忘記了仇恨，願意成爲袁世凱手下的「第一流入才」（當時熊內閣稱爲「第一流入才」內閣），端以爲被冤死，走狗可以不烹，而且還以爲在袁世凱這個變相的「君主」之下，可以繼續借國會積積立憲的基花樣。

袁世凱在內戰勝利後，留在北京籌會內的國民黨議員居然和進步黨議員合作起來，彼此都還想弄袁世凱這個「總統式」的新君主權力下嗜一下所謂「立憲」之骨頭，想拿「立憲」作爲自己的遮羞布。這些「君主立憲派」放心袁世凱，可是一切反革命的大獨裁者都是最可疑的，袁世凱究竟放心不了「君主立憲派」。地主資產階級（包括一定部份的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

「與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最厚的一部分）的講裁減之開還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縱使袁世凱相信這套君主立憲派對他十分忠心，但多他們究竟染一些過去士大夫的學究氣味，做起事來還有斯斯文文的味道，不覺痛快，而袁世凱却是要大刀闊斧的。於是，袁世凱又在國會中收買一部份議員，製造一個更直接的御用黨，這就是民國二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所謂「公民」黨，以作袁世凱在國會的直接打手。

「這個打手黨的「第一步政策則在選舉袁氏爲正式總統」。本來在當時國會中，有一種「先定憲法、後舉總統」的意見，就使進步黨領袖段祺瑞開始也持這種主張。可是袁世凱却迫不及待，急於要做一個沒有憲法的正式總統。這個打手黨出來活動，而進步黨也轉爲忠心於袁氏；於是事情便倒過來，先舉總統，後定憲法了。打手黨成立後不過二十天，十月六日，「由兩院組織選舉會，派遣軍人到會，強迫投票，議員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買囑號稱「公民團」者數萬人，整齊嚴肅如軍伍，旬圍衆議院數十匝，迫即日選出所屬望之總統，否則則選舉人不能出議院一步。選舉人不得不俯首聽命，忍餓絕日，以行選舉，直至袁世凱當選之聲傳出，公民始高呼大總統萬歲，振旅而返。」

「不是國會對袁世凱使用權力（不是國會授權於袁世凱），而是袁世凱對國會使用權力（而是袁世凱授權給國會）。議員們餓足了一天的肚，袁世凱玩足了一天的把戲。利誘加威脅，國民黨議員，進步黨議員和公民黨議員都一擁投了袁世凱的票，袁世凱如願以償，而且在選舉後四天的辛亥革命紀念日（十月十日）就職。

袁世凱得到了「選舉」的勝利，國會在人民面前宣告了破產。

袁世凱就職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書，開章明義，又是重復了過去在臨時參議院所說的「法門」：「立憲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飭紀綱。」他又重復了他在前「法門」裏說的話，對大總統職位

於「職責」，必須責任。「國民一份子責任」：

七月間，少數國民，破壞統一，傾軋國家，此東亞初生之民國，堪憐焉。保。余爲救國救民計，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厭亂，將士用命，及五月，內亂戢，政軍解職歸田，長享共和幸福，而國民會議舉相推舉，各友邦又以余誠實之目，爲承認之期，何敢高蹈鳴謙，以致搖動國基，負我父老子弟之期望？蓋余亦 民一份子，敢發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也利歸不取知，苟逸豈舉不敢計，是以勉就茲職。」

你看！又何常是他自己與權力？當然還是老調子：及人民的大獨裁者天天認爲他的權力仍不足。又天天認爲他是第一倒不想要權力的人。

在宣言書中，他「以極誠懇親愛之聲」，向「國民」講述他的「共和」大道理：即所謂「道德爲體，而法律爲用」。但一切按照他歸納起來，「仍不外道德二字」，「約言之，則忠信篤敬而已」。「忠之本義，忠於一國，非忠於一人也。人人以國爲本位，勿以一身一家爲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天下……不以己之權利，妨礙國家之大局……」。不消說，袁世凱 第一「不以一身一家爲本位」的。「孔子云：『無信不立。文明各國有以詐欺行爲誦人者，其受辱若楚之於市朝……』前清會國藩云：『立身以不妄語爲本』。不消說，袁世凱 第一「守信約，不妄語的。」「奉公守法者則爲是爲善，越禮犯義者則爲非爲惡」。不消說，袁世凱又 第一「奉公守法、因而他所做的事又第一個都是對的，也都是善的。總言之是什麼呢？就是只有他 第一個合格的國民，因而 第一個配當民衆的大總統，所以，他結尾就還末檢：「余所以最誠懇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曰：余一日在職，必一日負責。」「最誠懇親愛之意」，這句話在宣言書重複了兩遍。但後面所說，不消說乃是更其真實的，這是給人警告：他必堅持他的權力，他的權力是斷絕不可侵犯

的，如果有誰或什麼侵犯到他的權力毫釐，他就將無情地把他繼續打下去。

袁世凱授權給國會，主要的只是「選舉」做總統一件事。這一件事完畢之後，就準備以大總統的名義行使自己的全權，不要再授什麼權了。袁世凱看來，如此便已完成了任務，功德圓滿。會對於他已不算「花瓶」而且只一個無用的累贅廢物。可是袁世凱不無趣地總想：壽命還可以「靈光顯現」爭妍，而且還是色色總麗麗的袁世凱，長顏色。袁世凱並不感謝這「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剝削人的殘酷無情，反映其在政治上對待人的刻薄無情。並且因為有外國帝國主義者在金錢上武裝上的輸血，這大地主大買辦更感到政治代表者感覺到出還年青貌美，精神力強，而「民自覺性的不足，又加深了他的自信。他認為這種花瓶有時候有用處，但有時候反而使自己高貴。在袁世凱總統後幾天光景，就出面向國會與公佈「憲法」的權力，說是「所有之法令，均須經大總統公佈，始能生效」。就其說，不經過他完全同意的憲法，不是經過他親自製定的憲法，說「能什麼「憲法」。袁世凱也可以有別的「憲法」，但則限定只能是絕對專制主義的「立憲」。只能是把他的絕對專制主義寫為成文的「憲法」，而不能有任何越過這個界限的「立憲」。十月六日，他又向眾議院提出增修約法以便放任大總統的權力，「總攬行政之統一」。他說：「本大總統一人一身之受束縛於約法，直不啻吾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束縛於約法」。你看！他一人一身受約法束縛，就是四萬萬同胞身命財產受約法束縛！「朕即國家」的思想，公然躍在紙上了。同月二十二日，他派選了八個欽差干涉憲法會議，說他「對於民」根本無識之憲法，典，設所不知不言。或言之而不盡，殊非對於民國之素志」。可是那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覺得這樣對「憲法」的面子太難看了：憲法可以變成大總統權力的註腳，但也要別人代註，而不便由大總統自己來作註。結果八個欽差沒有列席。袁世凱終於同月二十五日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說：「憲法草案法的一些人，」始期託名政議，為虎

作優，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聞其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簡直是「國會專制」；「值此建設時代，內亂外患，險象環生，各行以官力負責任，急起直追，猶虞不及，若反消滅行政一節獨立之權，勢非亡國滅種不止」；「各該文武長官，同為國民一份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於是袁氏的一批爪牙馬上亦以「國民一份子」的身份，都一致起來附和作牛馬嘯了。

袁世凱心停止國會的存身，第一步便是設法堵塞國會的開會活動。於是，十一月四日便藉故下令（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副署）追繳四百三十八人的議員證書徽章，說：「我們「但知構亂，以便其私，早已置國家危亡國民痛苦於度外，亂黨殘民，于斯為甚」。這幾多議員們雖然在國軍中，後還誠懃懃恐避世凱做總統，可見袁世凱究竟還認爲他們「願以民國政府為政體」；「願以民國國軍為救兵」；「願欲破壞民國之管一而不節」；「願欲引起列強之干涉而後快」。下令後的第二天，袁世凱派軍隊拿着幾隻追繳議員證書的名單，守住各議院的人口，一切到會的議員都要受嚴厲的檢查，國會開會就不是法定的人數。這是袁世凱迫使國會無法開會，作爲解散國會的第一步。

這樣，使得還沒有被追繳議員證書的議員（大部份是進步黨的議員）即「進步黨議員」也與了。他們向那以進步黨爲主的國會開會質問：「政府以去官筆，挾其氣爲前導，實屬議員等宗旨符合，惟去之之方，是否適法，挾之之道，是否誠心，察復與處，勢難毅然！」「既以非法使國會永無開會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壞國會之名，究竟奚所取哉？何居心？」「國會第一流，才內閣的總領銜，問其答復：「大總統於存亡危急之秋，爲整齊政體，是「非心途，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繩。」總之，袁世凱做的事情，沒有一樣不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沒有一件不是「救國救民」的。袁世凱在停止國會活動之前，便已召集了一

個御用機關，即所謂「中央政治會議」，並御用機關，便代替了國會，「袁世凱乃首肯欲」。這些日子，袁世凱的各省「軍民長官」。根據袁世凱的意旨，復電陳所謂「救國軍政府」，袁世凱即以命令宣佈國民兩院所有議員，選舉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國會解散了。這。人民啼笑皆非的國會。它的解散，是在它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日子起，便已決定的。離開選舉時，僅僅兩個月，離開召集時，也不過九個月。應該更恰當地說，它。召集便決定了它的解散。二月三日，又等辦各地方自治會，二月四日，又交政治會議議決解散省議會，題目仍然不過「統一」。熊希齡辭去了這一切命令之後，也因功德圓滿，被袁世凱一腳踢出了內閣。一時興高采烈的進步黨，再無望承原邀寵，漸漸地消聲匿跡起來了。

袁世凱由御用機關「中央政治會議」製造一個「約法會議組織條例」，召集所謂的法會議，修改約法，把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和專制皇帝的權力一樣：「又復訂定治安警察法，以併個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中央集權，元首獨裁，完全告成，袁世凱隨心所欲，一呼百諾矣」。五月一日，袁世凱公佈了修改約法的宗旨：

「查中國有歷史數千年，治亂興亡之迹，代各不同，然無論何種時期，其治之能治，不能治，率視政體之能一與不能一以為衡。是以春秋著大統之文，孟子導定於一之訓，統治權惟一不可分，……方今共和成立，政體變更，而細察政權之轉移，實出於因，而不出於創，故雖易帝為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實望於政府者獨重，而實望於議會者尚輕。使為之元首而無權，即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羣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

「優待條件，為統治權轉移所關，亦民國國家之所由成立……」

「改選以爲根本。法，首在力求寬裕，而不徒飾美觀，首在多多數人謀幸福，而不在于與少數人言感情。教團但出於至誠，毀譽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陸大總統之權，而實以重大總統之實……。」

宗旨具有麼呢？說來說去，又是：第一是「統一」，第二是「統一」，第三還是「統一」。什麼是統一呢？按照袁世凱的「統一」或是總統的權力是等於大皇帝。袁世凱讀袁公佈的總統「統治權」是從清朝廷轉移來的，是清朝廷委任的，因此，他的權力必須因袁滿清皇帝的權力。按照袁世凱：當有了這樣權力的時候，或就自治，或會亂，而且大多數人還會因此有「袁世凱」。現在袁世凱地真正有了這種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規定在體的「法約」上了。

袁世凱有要求不盡的「統一」。因爲這箇中世紀的奴隸和大洋行買賣的最高代表人對於權力的要求是不盡的，當他得了一個「統一」，馬上便接上再來要求一個「統一」。民國二年的內戰，是因爲「統一」，後來解散國會，是因爲「統一」，現在修改約法，又是因爲「統一」。這就「他的「勤求治道」。這樣，「統一」又「統一」，便一步一步地把袁世凱推上權力的尖端，同時一步一步地把袁世凱送上墳墓的邊緣。

(五)

在前面所述的時期，袁世凱迫在民國總統的新形式下，發展專制皇帝的內容。把這個內容規定在約法的約法之後，他便逐步地要去掉這個新形式。這個「舊皇權中撫育壯」起來的老軍閥官僚，非常羨慕皇帝形式的尊嚴，而大地主世襲財產的要求，正希望由皇帝的世襲秩序重新表現，並重新鞏固起來。爲着要加封黃袍在自己身上，這箇大獨裁者首先安置他的部下以皇帝時代同僚的官職。內閣總理制的職務就不存在了，在袁世凱總統下面設下了「段專使」，有「和和宰

相彷彿的職位與名義，叫做「副參相」。這個新宰相，就是前清和袁世凱同僚、而又是最常的舊宰相徐世昌，當時人們已毫不掩飾地叫他做「徐相國」。在左邊，還有一個叫做「左丞」，在右邊，還有一個叫做「右丞」。儼然是皇帝的輔行。隨後，他又把各省都督改名為將軍，民政長改名為巡按使。這些都是告訴了他的部下：「你們都已有了皇帝時代的官號了，難道可以沒有皇帝嗎？」

「中央政治會議」與「約法會議」既完成了袁世凱個人集權所需要製定的條例，因此就結束了它的自身。政治會議的所有「議員」皆以次得勳章有差。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公佈了參政院組織法，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參政都是袁世凱委任的，共七十個人，按一低。袁世凱背後當太上皇之一的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話，是所謂「中國昔時之老成物望者皆踴躍而出」，前清大老和袁朝寵貴都在其列。進步黨的人物本來是「韓學夫人」的，此時却由夫人降作婢，也在參政院中坐了幾把交椅，熊希齡梁啟超在內。副總統黎元洪當了院長，前國會秘書長進步黨林長民當了秘書長。六月二十日這個參政院成立，據一個新聞記者所述：「參政請公紛紛入場，老翁不見蹙蹙之容，少者亦無倉皇之狀，盛哉其彬彬有風儀矣」。但是參政「請公」固然有「威」有「儀」，「盛」則未必。那裏是一派古香古色，又是一片零零落落。開幕時，連宗旨都沒有說明，也沒有二人登台演說。因為：這實際上只是籌備袁世凱帝制的專設機關，宗旨是不好公開說明的；「參政」們也都個個心裏明白，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話可說。

「約法會議」在「約法」上規定了總統等於皇帝的權力，而參政院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把袁世凱這個皇帝式的權力規定為無限期。權力。原先，在所謂修改「約法」的時候，有一個袁世凱陛下條約——四川城口縣知事姓陸的——揣摩了袁世凱的意思，呈請將大總統任期改為終身而止，就「內亂可滅，外患可靖」，袁世凱假惺惺，「初聞之，極為震怒，因種弁違約法之故。細細思所陳理

由，極可實行，故乃憲法各省都督長官，徵求意見。現在這個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就把袁世凱這個題目「極可實行」的「理由」，在「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上變成實際的條例。其要點有三：第一，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亦無限制；第二，凡屆總統改選之年，參政院參政得決議現任總統連任，無須改選；第三，總統繼任人應由現任總統推荐次期大總統候補者三人，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現任總統當然得以繼續當選，現在總統的兒子同樣。袁世凱的終身總統制，就是這樣規定的。這是「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為袁世凱籌設帝制的第一步「立法」。

袁世凱終身實行帝制，這早已是人們所窺見的秘密。民國二年三月間，有一個湖北人姓袁的，「呈請暫改帝制之懇，獨國共和」，但是那時，袁世凱知道在野黨還沒有倒，情況還有所待，而且覺得這個姓袁的這末一說，無異洩露「天機」，可能給在野黨以口實。於是這個姓袁的，不但沒有因此邀寵，而且因此大倒其霉。袁世凱那時命令說：

「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兢兢焉其能力，為補共和之精神，維憲政之環境，永不受帝制專見於中國；凡所設施，舉以國家為前提，合共和之原則，當為全國人民所共信。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為（指那姓袁的上書），若非喪心病狂，意存嘗試，即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鷲為鴛人，醫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視聽，極其流毒，足以破壞共和，謀毀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舉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與實及此，事權攬勝；帝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按律嚴治，以為猖狂惑肆干冒不諱者戒！」

可是，自從內戰勝利，國分解散之後，袁世凱自己所說的「喪心病狂，意存嘗試」，「破壞共和，謀毀民國」，却由他自己逐步地暴露出來。他一心一意地很快地「使帝制再見於中國」。當時事實上有一種帝制派，其一是建立袁朝之帝制派，其二是清朝復辟之帝制派，後者這部分人屬於清室的少數遺老遺少，他們對於袁世凱在「祭天祀孔，大事復古」，知道袁世凱快要稱帝

了，但是，他們覺得袁氏和他們本來仍是滿清朝廷的臣子，如果要恢復帝制，便不應該由袁世凱自己來做，而應該恢復他們本來的「君主」。袁世凱對於他們這樣公開倡議復辟的議論是不可容忍的。皇位雖然本來是清朝的，但是既然把握在他的手裏，怎麼能夠再拿回去呢？於是，袁世凱就大發其雷霆了。先由袁氏的舊僕所謂「憲政使」夏壽康來一個呈文，說是「大總統受全國人民付託之重，值此安危呼吸，斷不宜避嫌姑息，致釀亂機」，而後由袁世凱「批令交內務部查辦」。他自己又下了命令：「須知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當然，袁世凱並不受這種「常刑」的限勒。這種「常刑」的所以限制那主張復辟者，僅是爲着便於放手製造袁氏的帝位之目的。

俗語說得好：鱗角但不得火的。袁世凱的準備帝制既路人皆知，而要達此目的，袁氏正準備和全國作戲。袁氏了辦這件事必須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才可以有爲。日本帝國主義也正利用了袁氏的弱點，以實行其擴張領土的計劃，而西方帝國主義大戰又正是幫助了它的機會。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袁承認。當時日本公使日置益手遞條文的時候，他狠容氣地，而又半吞半吐地說：「請大總統高升。」袁氏笑納其呈，低首而退。日置益又對當交涉之總領事曹汝霖說：「做向以萬世一系爲宗旨，中國如欲改政體爲復辟，非做則必贊成。」當然，中國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近代中國人民爲祖國的解放而鬥爭已流過無數的熱血。條件公開之後，「當下各團體開紙上都寫着『誓死反對』，加以論斷，中國報紙才得轉譯出來。二十一條的內容，頃刻哄動全國，一般熱心志士、愛國人士，都以爲亡國慘禍，已降厥來，莫不奔走呼號，誓誓而起，到處開會演說，震盪輿論，有的則直上書，有的斷指自誓；風起雲湧，總算全國一致。」（「中華民國史演義」）袁世凱對於人民所發的運動，採取了絕對的高壓手段。就使這種愛國運動限於狹窄的日置益領土，世不許其新編。做這種運動的人物，都被官廳

「敬請」：比如，當時日本人的轉關都公館了，請如此類的電訊：「以鼓吹排日幾多數之印刷物，自東京運之，給予中國人。本日立被官廳逮捕，英界商場方演奏排日劇，以中國官憲之要求，停止之。」差不多日本人的報紙每日都登載了各地的宣傳，官廳這種種壓人民愛國運動的消息。同時，日寇的海軍則開進中國來巡邏，陸軍也進入許多地方，「維持秩序」。袁世凱抄襲過李鴻章以前對英的政策，結果是：「各國公使皆向外交部通告，中國須和平解決，切不可發生戰事。」五月七日，日寇送了最後通牒，並限四十八小時答覆，須完全應允，否則自由行動。袁氏爲了「高陞」，完成了日寇的願望。偉大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就此開了新記錄。

五月十日，袁世凱下了「密諭」。他說：

「前清末造，政失其綱，泄沓成風，無人遠慮，加以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衛國？……」

「經此次交涉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翻籠心魄，力圖振作，倘仍復悠悠，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

「……持危扶顛，端資策。我國官吏，積習太深，不肯者竟敢假公濟私，庸庸者亦多玩物喪志，敵國外患，漠不關心，文恬武嬉，幾成風氣……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苟利於國，生死以之。」

又，七月二十二日，「國務卿面奉大總統諭」：

「試思甲午庚子兩役，何嘗不言臥薪嘗胆？而偽日拙，以迄於亡……來日大難，寸陰是競……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

但是，「作偽日出」的，恰又是袁世凱自己。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這末一個「外交大勝利」之後，就對於中國的統治者來一個嘲弄，那時東京，居然有人到中國使館前大呼「支那外交大勝利」

萬歲」者，於其袁氏黨徒也就做了東京辦事的應聲蟲，自己起來嚇弄自己，說這是「中國外交大勝利」，或「元首外交成功」。

這裏且回憶一段內幕：日本人原來的二十一條要求一共分有五號，其中第五號是要求用日本掌握整個中國的政治、財政、金融的大權，等於完全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曾號稱要求，且預定不要袁世凱答應的，而是爲的拿這號要求來便利於袁氏答應前四號要求。袁世凱已決定答應這第五號要求，並叫曹汝霖到日帝館去表示「進步」的時候，忽然得到了日本已決定撤回這號要求的消息，於是才改了口氣。而在最後覆文中變成了「日後協商」。袁世凱答應的東西，超過了日寇原來真正希望的東西，而從一月到五月七日關於第五號要求的往來周旋，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虛偽的作態。可是，袁世凱和他的黨徒因此就有了「勝利」的題目了，而且袁世凱的黨徒還希望提提遊行、開會慶賀呢。日本覺悟者拿二十一條作爲幫助袁世凱稱帝的禮物，而袁世凱則拿二十一條的「外交勝利」作爲增加稱帝的掩飾。你看！直到十年之後，還有一個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替袁世凱辯護，說他在這幕交涉中「政策頗爲正確」和「捷才機智」，爲什麼袁氏黨徒當時不會喊「袁萬歲」呢？

當袁氏告訴人們要「痛定思痛，力除積疾，奮發進行」的時候，正是袁氏黨徒進行帝制的時候，又正是袁氏忙於「關誦」的時候。民國四年七月，報載袁世凱對馮國璋「表明至爲痛切」；以余今日之地位，其爲國家辦事之權能，即改爲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自古君主之世傳不數世，子孫往往受不測之禍，余何苦以此等危險之事，加之吾子孫也！……余已在英購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則余惟有遷赴他邦」。到八月間，袁世凱有一個美國「顧問」，叫做什麼古德諾的，寫了一篇文字，認爲中國適合於君主制，而不適合於共和制。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那些袁世凱的走狗都一齊大吠起來。沒有幾天工夫，楊度等一幫人的籌安會也

出現了。所謂安會六君子，楊度、嚴復在清末本與君主立憲派，孫毓筠、胡漢民、李燾和本是同盟黨和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劉師復本是同盟會員而早向滿廷告密的叛徒。籌安會的宣言是這末寫的：「美人大政治家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各國，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說非獨言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著明……」。這些中華民族，醜惡的政類，把一個外國政治流氓叫做「大政治家」，而又把他幾句話，捧之如神聖，以作為他們發賣民族的「合法」經典，袁氏竟找到了外國人領港，於是他夢想的帝制運動就急轉直下。

一些天真爛漫的人要求袁世凱發揚旌節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國體」。但是，這個時候，袁世凱用得着「自由」。「自由」袁世凱那裏找到了存在。他說：

「予所居地位，祇知民主政體之組織，不應別有主張。且帝王總統，均非所願意……無論研究者作何主張，於余個，固無嫌礙可說。余及國人均，身家產業予孫親族，人皆切已，自當研究所以永保安泰之法。予既受國付託，何敢以非政體二者之嫌疑，而強加干涉？」

袁氏又說：

「此日如不任命學者輿論自由研究此項問題，則有一部份主張傾力，恐以武力搖撼國體，不如此變和其空氣。」

人家說他更稱帝，他却說連總統都「非所願意」。人家說他依靠武力，帝，他却說「自由研究」所以避免「武力搖撼國體」。而且，還是沒有一點私心私利，只是為的「人們自由研究身家產業子孫親族「永保安泰之法」，但係憐憫什麼袁世凱所謂「自由」呢。袁世凱的自由，是在「民權」內，有鼓吹專制和帝制的自由，有反對民權和民主的自由，但不能有鼓吹民主與自由

的自由，不能有擁護民國的自由。於是，「自由研究」的籌安會門口，有了袁世凱武裝的軍警站崗，這就是所以保護袁世凱特許的自由之神圣不可侵犯，又所以表示袁世凱所不允許的自由之必須鎮壓。

袁世凱既使用了「自由」，便又使用了民意。有一本演說這是梁士詒對太子袁克定的獻策

●梁士詒說：

「依我愚見，爭王定霸，固然須以武力為主，最爲名正言順。現在是取之於民國之手，自然以民意爲第一。而且民意兩字本是隨各人之用法，顯之側之，無不如志。此外，在能得外交財政上之助力，便無小成的事。」

這雖是小說家言，但却反映了袁世凱一類人對於民意之看法，而且袁世凱的帝制運動的確是

按照這種「顯之側之」的方法泡製的。

爲什麼袁世凱需要使用「民意」呢？正因爲民意最敵視了袁世凱。雖然在袁氏的高壓下，但是，帝制運動很快在人民中間引起了普遍反對的浪潮。這種反對的浪潮，一直影響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在他們中間也引出了堅決的反對派。有一個叫做任鳳濱的，寫過一篇「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認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之學，斷非所宜」，而「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最爲適當」。關於世襲問題，他說：「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一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由今大總統袁世凱自代……會選舉，祇限止三人。期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這個擁護「開明專制」的「顯子」還得專制與世襲的問題都已解決了。他覺得在中國的新情況下，這種新式的專制與新式的世襲，比起舊式的專制與舊式的世襲，更不易於鞏固統治。如他這新形式之「顯子」——「大總統」改選爲舊形式的「顯子」——「大皇帝」則必「招風起浪」。爲了不至於引起這種結果，這個老顯子是極力爭的

，他說：「余以此文，即預備軍政執法處矣。」這有一個梁啟超，這給大家所知道的，自從帝制倒後，他就和袁世凱實行了公開決裂。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這個時候的一篇名文；實際上，他和袁世凱徒的根本上歧，是在於「還沒有到時候」這一點上。他的文章說得很明白：「……蓋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制，庶易以圖存而收效，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皆即臥薪，還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致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英雄割據，割滅之餘，乃定於一。」

梁啟超不希望走第一條路，而認為：

「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間前途一縷之希望，豈不在是耶？」

可是這第一條路現在是否可通呢？梁啟超說：

「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他？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隣脅迫，香鑿定盟，水旱厲蠶，災區徧函，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聽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縷之希望，萬一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

梁啟超肯定袁世凱請帝時機還沒有到，如果一定馬上要幹，袁世凱就一定要跌下去，而永遠爬不起來。他直接向袁世凱告誡過：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衆失之鑄，舍磐石之安，戴虎尾之危，在萎靡之心（老百姓歸向之心），長荏苒之態（長反抗者騷擾之志）？……愚用椎心泣血，進行最後之忠言。」

梁啟超的言論反映了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危機的發展。他企圖使袁世凱取消帝制運動，而避免人民革命危機的爆發。他對於袁世凱的統治，表示了推心泣血的忠誠，但袁世凱却窮之窮。反人民的大獨裁者把自己的權力推到了極限，要他那樣像梁啟超所說的「內治修明、百廢俱興」或「專精一慮、爲國家謀大興革」，那完全不可能。相反，他只能製造無窮的內亂和外患，並「專精一慮」來對人民進行不斷的戰爭。

袁世凱的決定是不可挽回的。合起來有數百萬大數目的寄生蟲——軍隊、警察、憲兵、官僚和士豪，他們原來是爲大地主大買辦的利私而服務的，而由他們所結成的機構，又是舊皇朝傳下來的東西，保有極深固的舊皇朝的傳統，袁世凱既依靠了他們做總統，現在又決心依靠他們嘗試一番龍座的滋味，同時相信經過他們的「顛之倒之」，一定可以顛倒出一種叫做什麼「民意」的東西來，以擁護他登上龍座。

先是，由籌安會通電各將軍、巡閱使、巡按、都統、護軍使、各地商會，請他們派代表到京，以便一致贊成「君憲」或「共和」。當然，這所謂「君憲」，並不是原來君主立憲派所活動的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而是袁世凱這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形式的君主，現在要採用公開的誓君主形式來統治全中國，而「立憲」乃是一種招牌。他說：「你們承認我這個君主吧！我給你們憲法。」如果有的話，還是什麼立憲呢？不另別的，這就是袁世凱式的極端專治主義的「君主立憲」。各省的文武長官，當然明白了袁世凱的意旨，都對於籌安會表示贊成，並紛派「代表」到了北京。籌安會本來打算經過他這一道手續，便由袁世凱即做起皇帝來。後來又打算，還是經過一道參政院的手續更妙，因爲那參政院是叫做「代行立法院」，「它既爲袁世凱無限期的皇帝式權力立法，便可以更爲袁世凱正式的皇帝大寶立法。於是，那些各省的「代表」便變成爲各種「公民請願團」，由籌安會代草請願書，向九月一日開會的參政院請願了。

正當參政院開會討論、將付審查的時候，袁世凱特派「左丞」楊士琦到院發表宣言，照例（是千百次重複地）說了：他「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即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諉卸」。他又說了：維持共和國體，尤爲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可是，在這下面，「然」字在文章上出頭了。「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似應仍聽之國民」。這就是說：他的大總統是由「國民公舉」的，假如「國民」現在不要他做「總統」，而要他做大皇帝，當然他也只得服從了。他說：「國民請願，要不外對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你看！「請願」要他做皇帝，是爲的「鞏固國基，振興國勢」，當然，皇帝應該做的。不然的話，豈不就是「破壞國基，削弱國勢」嗎？而反對帝制，罪名豈不在此嗎？他說：假如這種請願是「徵得多數國民之同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什麼是「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呢？就是說，他自必「接受」帝位了。

袁氏文章的意思，這樣：如果完全由參政院的形式直接解決帝制的問題，是還不够完備的，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他所以特示鄭重者，無非故作艱難，直逼出「民意」二字。」

在參政院開會中，由梁士詒組織「請願聯合會」以便「同心激進，計日成功」。同時，各種請願團到處「聞風興起」，而各種「請願團」當中，「乞丐請願團」和「妓女請願團」（妓女花元春所發起），則完全象徵了這個帝制逼出的真實政治，即是乞丐政治與娼妓式政治，而那批請願的「人」，不過是袁世凱收買下的一批政治乞丐和政治娼妓。

「請願聯合會」的聲勢代替了籌安會。梁士詒後居上，比總攝更急，成爲一個更急進的帝制急進派。在梁楊之間，因此惹起了一個層層激波（楊更以梁舉動爲憤），於是帝制則更提前了一步。「請願聯合會」根據袁世凱的意思，向參政院請願，請以國民會議爲解決國體機關

參議院將請願書八十三件送給袁世凱，並建議根本之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於是袁世凱就藉此發了命令，定於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國民會議」之複選，召集「國會」，解決國體。但是，這還需要兩個來月的時間。袁世凱和他的黨徒覺得夜以夢多，是不耐於守這兩個來月的時間的（雖然僅僅兩個來月的時間）。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將禽先猴，欲速故殺，又一種做作而已。」於是「請願聯合會」又以所謂「立法貴簡，需時實短」再請願了。參議院以為：「君主立憲乃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過遲，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法何自發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因此，它建議即用「國民會議」的初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袁世凱的民意使個劇，就還未演完了。以後，就根據這個製定的劇本，逐步演演出來。

袁氏黨徒們一些秘密的電報，後來被公佈出來，這些秘密的電報表現出袁氏黨徒演唱民意傀儡劇的經過，同時反映出清末和民國以來大地主、買辦階級統治民衆一種共同的面貌。這裏有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歷來所謂什麼「選舉」、什麼「立憲」、什麼「國民會議」、什麼「國民代表大會」之實際的精華，而且可以說，如果不體驗這些精華，就不會通曉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至少是其政治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會表現自己的幼稚。

這些電報是些什麼呢？請讀者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吧！

一、段芝費等十八人八月十三日發給電云：「現擬第一次辦法，用各省公民名簿，向參議院代行立法院上請願改革書，每省各具一請願書均由此間代辦隨將電報請將各省並貴省請願列入。」

三、九月二十六日孫毓筠發出電云：「現擬再籌徵求民意辦法，由各省將選派都統就在

省各縣國民甲，每縣指定一人，召集臨時國民大會。

三、九月二十七日電云：代表團提出電云：「各縣投票人，事實上仍須用各縣選舉字樣，以昭鄭重。一面指定各縣投票人，一面即將各縣投票人姓名，

分函各縣知事，補具詳文正式推舉，但須倒換日月耳。」

四、九月二十九日朱啟鈞等所電云：「現正擬另組國民大會，即各省地商開會表決，以期速定大計，惟組織方法，雖由參政院議定，而組織之精神，則在各監督教育有以操縱之而利用之。此項公民每縣擬公推一人，能於在省各機關中挑對此項人員，必不至於誤事。」

五、十月七日朱啟鈞等十八發出電云：「國民代表大會推選電中，須有「謹以國事公意恭錄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上完全奉之於皇帝；承天運極，傳之萬世」字樣；委託參政院為國民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至各省政各界，凡有簽名者，愈多愈妙，將來宣讀登報時，國民代表大會及預官政各界慶賀書，亦請預擬備用。」

六、十月十日國民會辦事務局發出電云：「國民會議議員各縣之初選當選人，實為舉出國民代表之樞紐，尤宜特別注意，各縣初選監督，當能體會天機，善為運用。儘可於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探其性行純正，宗旨一貫，誠實純樸者，預擬為初選當選人。再將選舉人設法指揮，妥為支配，更有滯礙難通處，不妨隱加以無形之壓制。」

七、十月十一日朱啟鈞等十八發出電云：「每縣初選當選人，各省報刊，必須設招待員，或派員疏通意見，再由監督官以談話宴飲為名，召之至者，將君惡要質，及中國大勢，並籌擬

定充選舉人名示之，須用種種方法，總以必達目的爲止。」

八、十月二十五日，國務局發出電云：「國務院改革，早能於形式上辦到，幸無億自足爲久安長治之基，凡關於法律上之形式，除確有障礙者外，務以表示鄭重。」

九、十月二十六日朱啟鈞等十人發出電云：「國會設法開議，即有推戴，無須再行投票手續，即由公等演說應推戴何人，即爲大皇帝，即贊成，應即立，表，後即將擬定之國民推舉書，交請各代表署名。事畢，再由公等演說推戴及贊成，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即將預擬之國民代表代行立法院章程，交請各代表贊成。至推舉書文內必須加入字樣，已將漢書奉還，此四十字，妥勿更改。」

十、十月二十九日國民會議事務局發出電云：「前次去遠以後尊皇用款，有其鑿鑿情形，統希隨時密示本局，當竭誠相助，以便會處放手辦事。」

十一、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會議事務局發出電云：「京外官署往來密商之件，實爲治亂安危所係，設或稍有洩漏，轉瞬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件若傳於道路，尤恐貽貽治亂之禍，此項對內對外，動關國家威信，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

十二、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會議事務局又發出電云：「此項電文無論如何秘密，終涉跡象，倘爲外人偵悉，不免妄肆品評，更或史乘流傳，遂成歷史笑話，中央再四思維，以爲不如一律塗明燒燬，萬望速速慎密辦理。」

讀者，難了了了？中國大地主，買辦的歷來政治代表們，一會兒可以藉口人民幼稚無知，這般的會不准許開，那樣的會也不准許開，如你要求有甚「民選」，要求什麼「國民大會」，要求什麼「憲法」，……等，那準定給你看一看他的臉色，盤察，殺頭，不一而足。可早，等到他……兒還得有需要了，於這這東西的出現，其這這簡也時你這這相信，你不來什麼

……

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到了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並冊封黎元洪爲武漢樞王。

袁世凱宣佈自己是民意所推戴的時候，他當然深知那所謂「民意」不過爲代表了自己專制權威的意志，而並沒有代表任何一個人民的意志。幾百萬的軍隊、警察、憲兵、官僚、士農和所有的軍閥官僚機構，是袁世凱權威的政治象徵。也。袁世凱權威的政治基礎。他們是向四萬萬幾千萬人民壓迫而取得生活，他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調和，但袁世凱專制的利益却是可調和的。袁世凱幹過了他們的手，盡量地利用他們的機構，而取得了「恭戴今大總統爲中華民國皇帝」的「民意」，正如一些外報所評論的，那不過是「以少數人之私心，詐稱合全體之同意」，而人民「固不願以袁世凱爲帝。始終未嘗請袁世凱爲帝」。實際上這等於在激動民意起來反對他這個「中華民國皇帝」。一個著名的故事：孫寶琦曾操爲帝，曹錕說，是兒要把吾放在燧火之上。可是現在袁世凱止是把自已放在燧火之上，但袁世凱他把自己放在「燧火之上」的時候，馬上就感到燧火就會燒死了他，他受百官朝賀的同一個日子，他發出了「申令」：

「好亂之後，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人民之公意，或違言煽惑，或勾結爲奸，甚爲同國之公敵，同種之喪民。……爲逆賊，各黨各派，各爲孽子，各爲禍家，衆所共棄，所紀具存，變離結怨。予雖有執法以繩，免自甘苦，着各省之武官劉勳陸榮廷，嚴督訪究，毋稍懈怠！」

人民的大獨裁者，又把人民的反對人的叫做「奸」，「好」，「公敵」，「逆賊」，「孽子」，叫做「逆賊」，叫做「孽子」；又把革命叫做「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而把反革命叫做「勾結爲奸」，「勾結爲奸」，「勾結爲奸」。這都是人民的大獨裁者在人民反抗面前，發表如何的態

快呀！牠就把自己放 爐火之上，而又怕被爐火烤死。但你自己已經把自己放上去，烤死也就是必定的命運了。

皇帝 袁世凱權威的最高點，又是袁世凱權威的最低點。這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冒險家打算把這帝位高升其無限制的權力在其手，但却因此大踏步地瓦解了自己真實的權力。他在集中一切權力的過程中，同於又逐步地集中了一切反對自己的力量。前幾年，一切反對派，改良派和帝 主義者如袁 凱 或秩序的救主，現在却認爲袁世凱這種稱帝的手段將很迅速地破壞那業已中衰，凱歌立起，秩序，而帶來的清朝復辟派，則袁世凱的旁邊擄掠額矣。如上所述，梁啟超，「異說所謂之體制題者」的文章中，已深深嘆息袁世凱將因此一蹶不振。梁氏給他的黨徒的書信中，更毫不遲疑地指出：「此人則既萎矣，曷易十五，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既無。越，所爭者早暮已耳。」因此，原來積極支持者，爲着「自存」，現在也變成了積極反對者。

袁世凱的太上皇——外國帝國主義者也都深察袁世凱行動的冒險。袁安會開始出現的時候，英國人辦的上海「字林西報」，八月二十七日的北京通信，這樣寫道：

「……袁氏之得以鞏固其地位者，多賴外人精神上、財政上之助力，外人於此又焉可無言耶？數年來中國危亂之際，外人勢力影響於中國事者，其功甚偉，難以盡述。就事實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權力，以達屬於國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時局，則非此間多數歐人所敢信者也，不獨信其不能改良時局，且恐時局反因此而愈惡。蓋外人知國人對於袁氏計劃，必有激烈之反對，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長子入繼大位，果能較勝民心目中所已信任之代表更爲安穩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

大家知道：日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皇帝的主要積極較勁者。但當帝制運動發展之後，它就直接向袁世凱政府勸告，應該中止自己的冒險行動。

「外觀雖似各地對於帝制之實現反對不甚激烈，實則反對之感情固為熾盛，不安之形勢深漫於各地。回顧袁大總統過去四年間之設施，已使國內秩序漸復，地方不安之狀態亦逐日消滅；大總統若維持現狀，無改已奉之方針，則秩序全行恢復，各地歸於安寧之日，蓋不甚遠。然今大總統如有突建帝制之舉，則上述反對之形勢或將立成，惹起意外之擾亂，使已形平靜之各地再成危險不安之域。在世界形勢有如上述之今日，目睹中國將發生此種危險之情況，帝國政府鑑於世界、局、利害，不勝憂慮。」

「……帝政府本防禍未然維持東洋和平之衷心，茲對中國政府先告以中國今日之情況最堪憂慮，敢附來自信不致發，異變而得平穩實現帝制耶？帝政府既已坦率披露其所見，決以友誼，勸告大總統善顧大局，延緩其參度具體之計劃，以防禍未然，而固遠東和平之基礎。此乃最賢明之措置。」

但是各個帝制主義者制止袁世凱的冒險已來不及了。袁世凱雖然對他們忠心，到這時候，和梁啟超的非步黨人同樣，他們知道袁世凱已經沒有希望維持他們所需要的秩序，他們只好以惋惜的心情，拋棄了袁世凱，而日本帝國主義且積極地幫助了梁啟超、蔡鍔等人到雲南去進行反袁運動。

人民的反袁運動，有它的弱點。辛亥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離開了人民，失掉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政治責任，雖然他們繼續參加了反袁的運動，帝制發生時候，並自過一些積極的行動，但是他們不論在實際的政治綱上、在實際的政策上、在實際行動上，都沒有明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西，他們的政黨——如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雖儘企圖恢復

同盟會的革命傳統，但却只成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宗派團體。而和人民羣衆沒有真正的聯系，不能成爲人民的首領。至於無產階級，因爲辛亥革命和歐洲大戰，中國工業有新發展，這無產階級便逐步壯大起來，但還不能壯大到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還不够壯大到成爲自己的政黨。因此，就還不能成爲反袁運動的領導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雖則一方面，反袁運動有極廣泛的統一戰線，但另一方面，反袁運動却缺乏人民革命的主流。運動是廣泛的，但却是自發的多。梁啟超等大地主士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力爭反袁的領導權，按照梁啟超自己的話，就是：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自求「樹立」起來。

袁世凱心不顧一切，和段祺瑞競走，看誰走在更前面，十二月十九日，段事堂「奏請」設立大總統處，而事實上在九月間已由梁啟超開自發等人組織起來，二十一日，袁世凱封了龍濟光、譚延闓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位。二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爲洪憲元年元日，預備督極

當進行籌備憲法的時候，袁世凱的命令是：「籌備事宜，務以簡略撙節爲主。」「不尙虛文，尙惜物力。」但據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報」所載：大總統預算草案，其總數已定爲五百九十一萬餘元。有一本書叫做「袁氏盜賊記」說：「憲法預算案，列出的，數目六千萬元，實數實未可臆斷。據民國五年九月六日申報所載北京電：財政部調查帝國稅款，實數達六萬萬元有奇。你看！這就，袁世凱所謂「用副貲還債，軫念民生之至意」呀！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反袁起兵了。袁錫勳當了反袁軍的總司令。雲南的力量並不大，但按照全國的人心，袁世凱的失敗是注定了。當時英美人辦「京津泰晤士報」論「袁世凱之前途危險」一文，刻劃出了自己帝國主義的心理，同時，也刻劃出了袁氏之無「挽回」命運：

「無論勝敗如何，袁世凱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觀望中鈞元首得保其威聲之日也。」

而事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不識取勸進之時機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當是之際，不受帝位而堅辭，吾知袁氏對內對外之威望，定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淪陷於力爭帝位之地位（原注帝位者非人民奉，袁氏乃一般徇私官僚奉，袁氏者也）。雖常，對於袁氏，未嘗不望其保有威權，以成中國現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爲帝，以致再生內亂，能勿覺其爲恨太大，而於國家無所裨益耶？

帝國主義者對於袁氏的必然沒落，是謂之「三嘆」餘哀」的。

袁世凱反抗的烽火業已舉起之後，機關及報端以「民意」的名義討伐反抗者。他說：「中御君意，正爲我國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時，概聽人民自由，並無絲毫限制。……不知君主立憲，既經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二二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觀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爲是非取捨之標準？無心爲準，任聽人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此次元首所以見信於國民者，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恪遵民意；夫共和元首，國民已有相當之敬禮，何如今日名分已定，天澤儼然，正殿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一方面說得多末「民主自由」呵！一方面又皇帝的臭架子十足。這末卑鄙！這末下賤！這末醜惡不堪！

民國十年，一月五日，袁世凱又發出了甲令，認爲「天生民而立君」，而且只有他有治國的本領，沒有非分之慾望。他又這末地描寫了反抗者：

「民國成立以來，暴亂之衆，狂妄之徒，各趨於權利之極端，爲非才之希望，或逞強力，或飾巧言，百計經營，務償厥志，意若無持，夕正首此，亦所心願。其次即脅制一隅，猶足慰情解勝。至於何以誣稱人民，何以統治京旅，何以因應外交，概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盜賊，惟不具賊，而無賊矣；即號爲有政治思想者，但經心靈之偵察，不願

事實之利害，懸空擲擲，大言炎炎，按之毫無實際。夫美術尙不可以學製，豈可以億萬生靈，供其輕心試驗乎？……人既無罪，未可舉全國之重，任人試驗，實僞處此，無從誘導……」

當然這是一套考調子。億萬生靈只准許供試驗，四年之內，他試驗的果西可真多了：一會兒內戰，一會兒五國大借款，一會兒由臨時大總統到正式大總統，一會兒解散國會，一會兒大捕大殺反對派，一會兒臨時約法，一會兒總法則，一會兒終身總統，一會兒簽訂二十一條，一會兒「國民代表大會」，一會兒大皇帝……這一切的試驗，由他說來，都叫做「拯救生靈，保護祖國」。但是，他決不能「任人試驗」，激烈的分子既同於盜賊，有政治理想者又毫無實際，他們都是野心家，如果一經他們試驗，由他說來，則都叫做「塗炭生靈，顛覆祖國」。於是，他在這同一天，再發出了命令，對於起義反抗的軍隊，實行「一體嚴懲防剿，毋稍疏忽」。二十五日，又命令着「各將軍及統兵大員」途進剿，以保地而安生靈」。當袁世凱的先鋒的，就是後來著名的賄選。總統費現，可是，袁世凱不「進剿」則已，一進剿就出現了更多的反袁軍。不久，又這一省獨立，又那一省獨立，袁世凱應接不暇了，「登極」的日子只好延緩下去了。

袁世凱本來向他的太上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誇口：「意外之亂，甲或猝起，中政府自信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付之力。」袁世凱不但對於他在全國的地位估計，是幼稚的，而且對於他和他的太上皇之間的關係的估計，也是幼稚的。他沒有充分地估計到：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如早看到他維持秩序不中用的時候，爲什麼一定還要他呢？爲什麼他們只要扶一個兒皇帝，而不可以多扶幾個兒皇帝呢？袁世凱原來預備以重要權利給日本，作爲日本承認帝制的條件，派了周自齊作爲到東京的使，日本已經表示歡迎，可是，忽然加以拒絕了。當時梁士詒即嘆息地說：「周自齊不能去，帝制不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決心拆袁世凱的台，以便扶持另一些新

俄國。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了當地說：「原來賣政府欲改帝制，本係保證無亂，今明明雲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制，無親友鄰勸告，則中政府之責任甚大，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袁世凱換了他的太。這頓毫不客氣的打擊，敗壞極了。而費又平迫着也，美、英、法各家雖然有願意應借的，但是「憲」名義的信用却不足，而日本帝國主義也盡力阻止他這條借債的路。袁世凱原來改在二月間登極，這樣，又只好作罷。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命令撤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仍然叫中華民國年號，並在命令中，仍然自稱為「本大總統」。你看！他本認爲「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爲恪遵民意」，現在他却不再恪遵他的「民意」，而毫不知羞地要「再維持共和」了。

袁世凱的兩個部下——馮國璋和段祺瑞，原來對袁世凱的帝制，是採取消極的態度，要政府所能夠感覺到的這種帝制的危險，馮段當然也能够感覺到，並且，帝制之後，皇帝的位子只能交給他的兒孫去世襲，而馮段却希望袁世凱大總統的位子，反人民的，獨裁者原來對於他這兩個部下的權力，仍然是吝嗇給予的。馮國璋在南京稱袁世凱看江山，可是袁世凱並不放心，馮國璋的新夫人，便袁氏派去着他作特務的。段祺瑞當袁世凱的隨員總長，可是袁世凱却另設了「海陸軍統率辦事處」，以削弱了他的權利，又另組了「模範團」以削弱他所支配的隊伍，而當帝制運動發生之後，袁氏且索性免了他的職。當袁氏這四面楚歌的時候，馮國璋便在南京採甲中間態度，一方面與袁世凱周旋，另一方面與段軍周旋，以便操縱其間，使自己形成爲時局的重心。段祺瑞則在袁世凱苦愁之下再度出山，利用袁世凱的危機用各種要挾，敲出袁世凱一些權力，由他組織了「責任內閣」，以便逐步地把段祺瑞的政權代替袁世凱的政權。有其師必有其弟。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其身。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時候對付滿清朝廷所使用的權術，馮國璋段祺瑞在這時候，也用來對付袁世凱了。

有一聲昨天還在袁氏西席稱臣傳乎的人，今天也馬上變成「亂臣賊子」了。又正如他復所聽：「左右離親，炎涼變態，利害則交亡。」袁世凱既這樣對待他的部下，他的部下當然會這樣來對付他。十年之後，有一個號「燕處客」的，論述當時袁氏的情況，寫道：

「陸榮廷於領餉之後，遽應西席，陳官於俯跪請臣，領川任後，亦一電來請退位，此其時也。袁之聲色均廢，於電文譯呈之後，汗流浹背，目眩頭暈，其愚為可憐，其情亦真可憫。」

袁氏生命就於這忽促間續進了棺材（六月六日）。當然，袁氏之殺並沒有什麼可憐，其情亦沒有什麼可憫。袁世凱政治的邏輯，引導袁世凱必然走到這末的結局。

袁世凱——這個反人民的獨裁者依靠外國反動派援助，依靠武力，依靠陰謀，依靠金錢，依靠欺騙，依靠假「民意」，一朝權在手，荼毒人民，被殺自由，無所不用其極，以為天下莫予敵也已，但如今安在哉？

只有人民是永遠不死的。

袁世凱倒了。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運動本身，並沒有解決那產生「袁世凱」這個政治觀念的社會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反袁的勝利並沒有變成人民勝利的結局。運動的弱點既如前兩所述。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去做這種解決，而無產階級又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由農民所組成的反袁的軍隊是掌握在投機的改良派和反動派手裏。他們所構的，仍然並且夕間變手為靈和覆手為雨的勾當。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所掌握的武裝是弱小的，而且不是從人民運動中生長起來的人民武裝。它的力量寄托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中國內部矛盾的援助上面（如山東所謂「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依靠日本的直接援助），而不是寄托在中國人民的援助上面，因此，就絕對沒有可能有什麼真實的成就。反袁之後，武裝依然是軍閥的武裝，政權依然是軍閥的政權。人民依然。

被踐踏在軍閥的武裝和政權的足底下。袁世凱集中的軍閥權力，變成分散的軍閥權力。事實上，當他把軍閥權力集中到最高點的時候，便已注定了這種軍閥權力之不可避免地由集中到分散。袁世凱還沒有死的時候，便已不可能挽救這種由袁世凱集中自身所造成的分崩離析的局面。袁世凱之死，只是這種變化局面的一個插曲而已。梁啟超原來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這是不錯的。但人民的革命洪水不是在袁世凱死後就馬上奔湧而來，而是——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相伴隨——還須要一個時間的積蓄和醞釀。人民嘗了滿清朝廷統治的經驗，嘗了袁世凱統治的經驗，但這需要一嘗袁世凱餘孽統治的經驗。

袁世凱這個北洋軍閥系統原來所包有的皖系與直系分裂的種子，在袁世凱死後，就日益表面化起來。先為表現為段祺瑞與馮國璋的矛盾，隨後更公開為段祺瑞徐樹錚與曹錕吳佩孚的矛盾。原來在袁世凱下面，而於皖系直系之外自成一系的宣統復辟派——韓子英張勳，於袁世凱死後不久，會驅走繼任總統位子的黎元洪，演了一幕復辟的醜劇。但皖系段祺瑞於同意後又曾約，上來天功夫，張勳這系勢力就被瓦解了。山海關外異軍突起而為北洋派別中的奉系，則逐步形成獨立的勢力，以與皖系和直系的力量相抗衡。

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當了大總統，實際權力是在皖系段祺瑞手裏。袁世凱所解散的國會，又召集起來（民國五年八月一日），但被段祺瑞張勳因參加世界大戰問題所脅迫而宣告第二次解散（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張勳復辟事業（七月一日到十四日），利用這個機會幹起來。戊戌的君主立憲派在復辟的醜劇中，實行了分裂：康有為與張勳一邊，梁啟超在段祺瑞一邊。張勳失敗了。直系馮國璋以原來「國會」所選的副總統資格繼任黎元洪，段祺瑞又做了國務總理。段祺瑞藉梁啟超黨人（此時稱為研究系）合作，另行選舉新國會（民國七年八月開會），研究系雖然棄了力，但這一「新國會」却以段祺瑞的直接御用黨——安福系為名，叫做「中樞國會」，而研究系

國民在政府組織上位置當中，不過有寥寥十幾個，做陪襯而已。馮和璋被段派所排擠，安福會也理應了曹世凱的心腹條件、北洋派元老，但沒有直接專權的徐世昌做總統，以便於段派的操縱。馮氏與南方的顧問官係合作，要恢復舊國會，進行了所謂「護法戰爭」，而段祺瑞則師承段祺瑞，堅持其清室團結一的政策。南方反對北洋軍閥——當時中國反動勢力的中心——的「護法戰爭」，在其方面看來，也有一定「進步」的意義，但因爲和人民脫離，被人民所冷淡。

袁世凱以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袁世凱死後，各個帝國主義各自找尋其傳力的工具。代表各大大地主大買辦的各派軍閥的鬥爭，其背後乃是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爭奪利益的鬥爭。皖系與直系鬥爭，實質上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鬥爭。皖系段祺瑞徐樹錚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表現了無微不至的忠心，向日本大借款，得到了日本的武裝，組織所謂「奉天軍」，由日本軍官訓練，實際上爲日的「掃蕩」反對勢力，進行專制統一。段祺瑞與日本簽訂了所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八年二月），在日本直接鞭撻之下，參與了干涉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直系和南方軍閥則得到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以便削弱皖系的勢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激起了全國人民反日的運動。袁世凱死後，第一次人民的大戰結束之後，真正湧出歷史舞台了。這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直系軍閥吳佩孚等以曹錕爲首領，利用了當時人民反日的情緒和助力，並聯合了奉派，於民國九年七月間，一舉打破了皖系。從這個時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政府取得了權力。曹錕與佩孚又繼承了世凱和段祺瑞，統一中央，以令諸侯，堅持貫徹專制獨裁的政策。

曹錕與佩孚一方面繼續和南方作不調和的戰爭，另一方面和奉系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這時段，孫中山在廣東依據舊國會的一些議員組織了「非常國會」，選舉了他爲非常大總統（十年五月五日），進行和東北張作霖聯合的政策，以反對曹錕。十一年五月間，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奉

軍打了敗仗。這進一步誘發了曹錕與佩孚斷全國權力的慾望。於是，曹錕於五月間採取了恢復舊國會（被叫做「恢復法統」）的口號，目的是一箭雙鵰：一方面迫得孫昌下野（因為他是「新國會」選舉的），另一方面也使得孫中山的權位失却根據（因為他本來是以「恢復法統」也即恢復舊國會為號召的），以便把曹錕抬上最高權力的地位。果然吳佩孚這一謀略發生效力：孫中山退位了。孫中山被他的那個和直系勾結的部下——陳炯明所逼迫而棄權，離開了廣州。直系軍閥利用黎元洪作為過渡的總統。曹錕與佩孚到處高聲疾呼，而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協約京漢鐵路罷工的工人，為歷史上最大的罪行。十二年六月間，直系軍閥進行了「逼宮」，驅逐黎元洪，其中參加的，不但有軍警，而且也還有「公屏團」。十月五日，五百幾十個國會議員每人得了五千元銀行的支票，於是這個袁世凱的舊部下曹錕「獲選」了大總統。這個選舉將要做總統的國會，依然是十年前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國會。這真是歷史絕妙的諷刺。「豬仔國會」、「豬仔議員」——這種稱呼，從此變成了全國所咒罵的通俗的稱呼。這多麼民主主義的國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完全的、最後的無恥破產。

曹錕與佩孚爬上了權力的最高點，正如他的老前輩袁世凱的經驗，注定了他們權力很快跌下來的命運。全國人民湧起了反曹錕的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了這人民運動的先鋒。各反對派軍閥利用了人民反曹錕的情緒（正如吳佩孚當年利用了人民反段琪瑞及安福派的情緒一樣），和曹錕對抗；而曹錕則利用了「統一」的口號，要削平他們。十三年九月間，爆發了蘇浙戰爭。接着又爆發了第二次奉直戰爭。直系雖然在蘇浙打了勝仗，但在北方，却出現了馮玉祥的倒戈。橫行一時而自以為武力天下無敵的直系軍閥，土崩瓦解，曹錕變成了階下囚，吳佩孚變成了流浪漢。

差不多每一派北洋軍閥的首領，都更密地爬上了權力紅極峯，而每一個都從那極峯跌下來。

結束了他自己。曹吳失敗後，段祺瑞又稱「執政」及其後北洋派種種的歷史，這些已經都是北洋軍閥統治的餘孽。在人民怒潮的沖擊之下，北洋軍閥已是日暮途窮的了。

忘記了戊戌政變時袁世凱的物質、初爲袁世凱服務、而反袁之後又爲段祺瑞服務的梁啟超，對於袁世凱曾經還未寫過：

「袁氏自身……以爲一切人類通性，維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劑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受被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寧盡之，使其不能自存。袁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自植其勢力……及其爲總統，乃益煽而揚之……」

袁氏這種政策，其實乃是近代中國一切反人民的獨裁者通用的政策。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特殊的政治或政治的特產。白刃與黃金——也即威脅與利誘，這是大地主大買辦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權術與特務都必須依靠這兩項東西運用起來，而其外國的主人則是這類工具的供給者。袁世凱及其政治的後裔「挾此二物以臨天下」，荼毒人民，戕害正義，其罪惡真是無窮的。而由于人民逼助的開展，袁世凱的政策後裔所採用的手段，比起袁世凱更爲殘酷，更爲險惡。更爲善於作假。

袁氏及其後裔都有一種所謂「正統」的觀念，認爲他們的統治系統乃各代表中通的正統，認爲中國必須在他們這種「正統」的號召下實行「統一」，而不能由人民的民主主義去實行統一。民國七年，段祺瑞曾向北洋軍人發出一個密電，說他「私冀揮挾北洋袍袖之實力。後一國家，奠寧宇內，庶幾人與得以安堵，法治乃得實施。」又說：「我北洋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洋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徵兆。」伏願諸君子……對於北方實力……

團結堅持……」段祺瑞認為北洋派軍中爲，沒有北洋派便沒有中國。這是代表曹錕以來北洋軍閥的「正統」觀念。民國十六年叛賣革命的新軍閥代替了北洋軍閥，新軍閥的獨裁代替了舊軍閥的獨裁。這種反人民的「正統」觀念又在新的獨裁者、新的統治者用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以示他們有用「統一」的名義來兼殺人民運動的權利。

毛澤東同志「論聯合政府」指出：「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成統一而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同志主張人民的正統，人民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說：「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從曹錕以來，北洋軍閥壓制專制統一。但是結果怎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身分裂，最後是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及人民集團抄襲曹錕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幾十年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踏上了峨嵋山。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還是叫給誰聽呢？難道是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聽嗎？」歷史的教訓就是這樣的。

中國人願聽，中國歷史的前途，因爲曹錕及其政治後裔——這類大獨裁者的阻力，經過許多曲折的痛苦。是的，中國人民及其世世子孫永遠不會忘記這種充滿了血和淚的痛苦。

但歷史前進的規律終究是不可阻止的。自式圖八年的五四運動和民國十年中華共產黨成立之後，中國歷史開拓了完全嶄新的時代，這是真正的人民的「洪水其來」的時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中國無階級領導下的大衆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建設了自己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總結了百年來人民鬥爭的經驗，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規定了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和人民運動的政策，使人民獲得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奮鬥的新步驟，發動了巨大的形式的羣衆運動。這種大衆鼓舞了民主派孫中山的革命熱忱，而且這種政綱和政策爲孫中山所代表的小資

邊疆和資產階級的政談所同意。孫中山會多失敗、挫折以及妥協的錯誤的長期經驗過程中，終於找到了革命的新道路，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偉大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組了國民黨，形成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孫中山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從舊民主主義走到新民主主義。這國共統一戰線就進行了第一次的中國大革命。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就是在這一次大革命中間結束了的。^張

在國共合作的問題上，孫中山節開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阻撓和謗謔，表現了不顧一切的偉大的革命英雄氣概。這是孫中山革命民主主義最高昂揚。這是孫中山的所以不朽。

真納，歷史上出現了極不幸的悲劇。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國主義，把無量數的人民灑在血海裏面，建立了新軍閥統治的朝代——地主大買辦統治的新朝代。「袁世凱」葬了靈柩復活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被踐踏在腳底下。袁世凱重覆了而又千百倍地殺害了袁世凱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權術，其手段，其政策，其口號。袁世凱則給中國人民們痛苦，引出中國民族的新災難，是不可計量的。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能手——毛澤東的領導下，却超越一切險阻而前進，不照不撓地爲解放而鬥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經過自己更無倫比的流血，已創立了不可戰勝的基礎。中國民族必將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後戰勝一切阻撓前進的敵人，而頂天立地地站起來，再是沒有疑問的了。

中國人民的勝利，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剝削度在中國的終結，這就是袁世凱的政治及其政治觀念的終結。

袁世凱那樣可恥的及人民大獨裁者永遠被人民所唾罵吧！

各種形式的袁世凱政治剝削和袁世凱政治觀念在新民主主義的頭前永遠死亡吧！

在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旗幟下，在毛澤東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旗幟下，中國人民勝利萬

後記

這本小冊子根據的材料，有白雲編著的「改組黨與中華民國」、羅權著的「民國政治史」、
「袁世生遺著」、王蔭生編著「六十年的中國與日本」、李劍農著的「中國政治史」等書。並
參閱所見之「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爲遠東報編見，文中所引材料，不再一一註明處所。

一九四五年六月

7

介紹 國大盜 袁世凱

出版	太岳新藥書店
發行	太岳新藥書店
定價	二十五元
總店	
分店	

7.6